

一、孙子智慧产生的背景

孙子以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彪炳千秋。孙子与《孙子兵法》的产生绝非偶然。

中国远古自传说时代的黄帝开始，便攻伐不休；到春秋时期，战乱更是频繁。随着人们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认识能力的逐渐提高，军事思想则由蒙昧状态日益向理性阶段发展。因此，富于智慧的华夏民族的军事思想在全世界发达最早。春秋时期，不仅军事家、政治家言兵，思想家如老子、孔子也言兵，而且出现了如《军志》、《司马法》等兵学著作，其中尤以《孙子》最具光辉。于是，在中外军事思想史上，《孙子》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对军事规律的认识和应用水平，出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①

孙子是时代的骄子，孙子的成就与他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实践的广度与深度、特别是所处社会环境分不开。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孙子智慧一来源其战争、政治实践，二来源于家庭、以及齐国、吴国乃至华夏军事文化传统与春秋时期社会进步思潮。^②

以下试从六方面论述孙子智慧产生的背景。

（一）新军事贵族世家家庭文化的教养

孙子的祖先原本是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国君。至陈厉公

陈继安主编：《毛泽东军事思想新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 页。

② 孙子智慧与社会进步思潮的关系，本书以后几章将继续从不同角度论述。

(公元前 706~公元前 700 年在位)的公子完,因为内乱不得立为国君,被降为大夫,后来又因为宗室斗争,恐祸及己,不得不于公元前 672 年(陈宣公二十一年,齐桓公十四年)逃往齐国(今山东中部和东北部)避难。

齐桓公十分器重陈完,想封他为卿。陈完不敢承当,于是被任为“工正”^①,掌管百工即手工业生产,并得到一块采邑作为世袭领地。陈完不愿称故国旧姓,改称田完。其实,先秦时,“陈”、“田”音义相通。陈完改称田完,只是改字,并未改姓。田完在齐国积极活动,颇得齐国姜氏贵族的赏识,齐懿仲将女儿也嫁给了他。他死后,谥号为敬仲。这位陈完,就是孙子的七世祖。

以后,传至四世孙无宇(田桓子)。这位与郑国政治家子产和吴国大学者季札并世的陈无宇就是孙子的曾祖父,一位活跃于春秋中期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陈无宇早年参加齐国对外的一系列战争。据《左传》襄公六年(公元前 567 年)记载:“齐师入莱(今山东昌邑县东南)……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误,应为惠宫)。”说明陈无宇参加了攻入莱国的战斗。陈无宇因膂力过人,深得齐庄公、景公的宠幸,官至“上大夫”,并奉命护送齐景公之女少姜赴晋做晋平公姬妾。^②当时,齐国卿大夫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陈无宇与鲍氏结盟,而与栾氏、高氏对抗。公元前 532 年,在一次战斗中,陈无宇听说栾氏、高氏将发动进攻,即向其宗族士兵“授甲”。他乘栾氏、高氏酗酒之机,先发制人;“伐栾、高氏”;战于稷(齐国都临淄城门名),栾、高败,又败诸庄(临淄城内大街名),终于将他们驱逐出齐国。接着,陈无宇采纳宰相晏婴的建议,把因获胜而与鲍氏一起分得的栾氏、高氏家产“尽致诸公”,于是陈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② 《左传》昭公二年。

氏名声大振，齐景公之母“穆孟姬为之请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陈氏始大”。^① 孙子这年大约 6 岁。

孙子祖父即陈无宇的第三子孙书，字子占，更是一位善于带兵、用兵的将领。《左传》昭公十九年（公元前 523 年）记载了孙书指挥的一次伐莒（古国名，今山东日照、沂水等县地区）战斗：“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鄆（今江苏赣榆县北，或今柘望与海头之间），使孙书（杜预注：孙书，陈无宇之子子占也。）伐之……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十四日）齐师入纪鄆。”可见孙书领兵攻城非常讲究谋略。他指挥士兵夜间突然袭击，偷偷攀绳登城，绳断后，城上城下的齐兵一起擂鼓喊叫，虚张声势，将莒共公吓得落荒而逃。齐国军队并没有经过战斗，当然也不会损兵折将，便很顺利地攻占了纪鄆城。因为“伐莒有功”，齐景公分封给孙书一块采邑在乐安（今山东惠民县）^②，并“赐姓孙氏”^③，以示嘉奖。因此，陈（田）书改称孙书。从此，乐安孙氏与田氏分开，各立门户。这年，孙子约 15 岁。

可见，孙子的曾祖父陈无宇、祖父孙书参加了国内外多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孙子的父亲名凭（冯），字起宗，任齐卿，是齐国君主之下的最高一级官吏，当然也熟谙军事，精通韬略。至此，孙家已积累了几代人关于兵学理性认识的成果。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家庭、家族文化的承传。孙氏家庭无疑为孙

^① 《左传》昭公十年。

^② 唐朝林宝于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写的《元和姓纂》卷四第二十三“魂韵”“孙氏”条下首列“乐安，孙武之后”。

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即1060年），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即1154年）。

子继承和学习先人的军事思想文化典籍提供了优越条件。孙子在这样的新军事贵族世家的家庭文化教养下，从小耳濡目染，直接受到曾祖父的耳提面命，祖父在战场上的言传身教，父亲的严格庭训。因而关于政治、外交斗争的策略和军事斗争的战术思想，在他青少年的心灵里已经滋生、萌芽、扎根了。孙子深厚的军事文化根底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打下的。

还须指出，齐景公（公元前 547 ~ 公元前 490 年在位）时代，田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田穰苴（音 ráng jū）与孙子曾祖父可能同辈，也是陈完的后裔。大约在齐景公二十年（公元前 528 年），晋国进攻齐国的阿（今山东阿县）甄（今山东鄄城县），同时，燕国又侵犯齐国的河上（今山东黄河南岸地），防守这两处的齐军大败。齐景公对此十分忧虑。晏婴于是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说田穰苴虽系婢妾所生，但是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请封为将。齐景公召见田穰苴，与他谈论兵事后，非常高兴，便任命他为将军，指挥军队抵御燕、晋的侵犯。临行前，田穰苴向景公说：“我素来卑贱，您把我从平民中突然提拔上来，位在大夫之上，恐怕士兵不服，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得到一位受到全国尊敬的您的宠臣来督察军事才好。”景公满口答应，当即指派了庄贾。田穰苴告别景公后，与庄贾相约说：“明天正午军门见！”第二天庄贾迟到，田穰苴按军法斩了这位位高犯纪的权贵，三军将士无不震惊害怕。不久，齐景公派来的使者径直驰入军营，传达赦免庄贾的命令。田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同时，又下令处分了这个在军营中擅自奔驰的使者，并遣送他回去复命。然后，军队随即开拔。

田穰苴爱兵如子，军队驻扎下来，打井筑灶，熬汤煮饭，他都要亲自过问；将士谁病了，就診吃药，他也要亲自前往关照。他还将国君赐给自己的钱财粮食分给士兵，自己留下的一份与瘦弱士兵领取的一份相差无几。因此，三天后，有病的将士都请求上阵，人

人精神振奋，争先恐后地奔赴战场。

晋军听到这些消息，吓得休战离去；燕军听到这些消息，被迫撤退，渡过黄河。田穰苴挥师乘胜追击，收复了全部失地，于是凯旋而归。他也因为军功被封为大司马，成了齐国主管军事的最显贵的高官。所以，田穰苴又叫司马穰苴。

田穰苴有兵法传世，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附有司马穰苴兵法被称为《司马穰苴兵法》简称《司马兵法》^①。司马迁读过这部书，并评论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尽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②意思是说，《司马兵法》内容博大精深，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大征战，也没能完全发挥出它的义蕴，至于它的文采，也略有夸张之处。班固也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③说明《司马兵法》虽成书于战国，却反映西周、春秋前期古“军礼（军事思想）”。

成长于新军事贵族世家的田氏家族子孙孙子对于其先祖田穰苴治军用兵脍炙人口的故事，对他所著兵法的内容，不可能不了如指掌。

如果将孙子行事、《孙子》内容与田穰苴行事、《司马法》的内容稍加对比研究，就不难看出孙子取法、借鉴田穰苴和《司马法》思想之处。田穰苴为了整饬军纪，整肃军威而立信，斩了违纪的监军庄贾，孙子在吴宫教战时也斩过两个不听军令的吴王宠姬，并将“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孙子·计》下引《孙子》只注篇名）

^① 《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汉以后失传，今传《司马法》五篇，为先秦残本，并非伪作，系后人辑佚本。

^②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汉书·艺文志》）。

看做军队胜负的关键；田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孙子也说过：“将在军 君命有所不受”^①；“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田穰苴爱兵如子，孙子则希望将领“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田穰苴指挥无比强大之军进逼晋、燕来犯之师；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孙子从中受到启迪，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威加于敌 则其交不得合”（《九地》）等重要战略思想。《司马法·仁本》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孙子也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计》）《仁本》提倡将帅应具礼、仁、义、智、勇、信六种品质，孙子也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可见 在主张以法治军、要求主帅有独立指挥权、爱兵、造成军队强大威势力争不直接交战便迫敌败逃或投降、重视战争、将才等方面，孙子和先祖田穰苴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正如郑友贤《孙子遗说》云：“《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司马法》体现了奴隶主军事思想，《孙子》反映了新兴地主势力军事思想，两者存在时代差异。这说明《孙子》对《司马法》既有继承，又有舍弃。

（二）齐国军事文化氛围的熏陶

孙子出生地齐国有着优良的兵学传统。

齐国始封者姜太公（师尚父，太公望，吕尚）是西周初期一位杰出的战略家、著名的政治家，在辅佐文王奠定周朝、帮助武王灭掉商纣王时立下奇功。《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博闻，尝事纣”；“卒西归周西伯。”周西伯昌（周文王）之脱羑里归，与吕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誓于牧野，伐商纣……师尚父谋居多。”

姜太公还有军事著作传世。《战国策·秦一》记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史记·留侯世家》提及张良颂读《太公兵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了《太公谋》八十一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南朝阮孝绪《七录·子兵录》载《太公兵法》三卷，《隋书·经籍志·子部》载《太公六韬》。上述著作可能保存了姜太公某些战略战术思想资料。

关于姜太公在用兵过程中巧出权变奇计的故事以及可能出自他大手笔的兵法著作，在齐国口耳相传，递相传抄，必然流传很广。早于苏秦、张良又出身军事贵族世家学识渊博的孙子必定听到过这些传说，读到过这些军事文化典籍。因此，《孙子·用间》在论述以上智为间谍必成大功时，以“周之兴也，吕牙（吕尚字牙）在殷”为例，认为姜太公在殷都纣王身旁搜集政治、军事战略情报，为周朝的兴起立下汗马功劳。这说明孙子对姜太公的权谋奇计非常熟悉。一部《孙子》，包含多少权变；《用间》反对占星、卜筮、望气以预测吉凶，都是从姜太公著作与行事中受到启发的结果。

春秋时期，大河上下，长江内外，浙江流域，演出了一场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小国的话剧。首先成就霸业的是齐桓公（公元前 685 ~ 公元前 643 年在位），而辅佐齐桓公的就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相国管仲。管仲深谋远虑，“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他在经济上，因海滨之利，推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①的政策。在军事上佐桓公“作内政而寓军令”，实行军政一体的治国

^① 《史记·管晏列传》。

方略“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①，从而使“百姓通于军事”，并“为三军”，率“教士三万人以横行天下”^②。在政治、军事、外交上，以“尊周室攘夷狄”为口号，“伐山戎”，“攘白翟（狄）”，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虽然一方面曾“救燕”、“戍曹”、“迁邢”、“封卫”，保护过某些中小诸侯国，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兼并弱小国家，扩大齐国领地。正如荀子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③；韩非子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④。同时，管仲相桓公首霸诸夏，相继举行召陵、葵邱等几次大盟会，号召诸侯们实践对周天子的盟誓。因此，管仲受到崇高的评价。孔子说：“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⑤司马迁说：“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⑥司马迁对管仲军事上的智计奇谋，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可谓推崇备至。齐国流传下来的有关管仲之谋的口碑与文献对孙子不可能不给予深刻影响。

约成书于战国中期托名管仲撰的《管子》尽管被后世学者评论为“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⑦，《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⑧，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⑨，但《管子》书多古字古义，毕竟保留了管子“手撰”、门人追记的“语录”、“逸事”之类。^⑩本来，《管子》刘向校本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其中《权修》、《七法》、《幼官》、《兵法》、《霸言》、《地图》、《参患》、《制分》、《九变》等篇专讲军事。只要略加考察，便可看出孙子学习、继承《管子》之处。

① 《国语·齐语》。

② 《管子·小匡》。

③ 《荀子·仲尼》。

④ 《韩非子·有度》。

⑤ 《论语·宪问》。

⑥ 《史记·管晏列传》。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零一《管子》条。

如《霸言》说：“明王……所重者，政与军；”《参患》还说：“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孙子则特别强调“兵者 国之大事”(《计》)《七法》说：“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参患》也说：“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必败，攻之自毁者也。”孙子则非常重视“庙算”(《计》)《幼官》说：“至善不战。”孙子则明确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谋攻》)《霸言》说：“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土，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孙子则极力要求“无恃其不来 恃吾有以待也”(《九变》)《霸言》还说：“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制分》也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孙子则坚决主张“避实而击虚”(《虚实》)此类例证 恕不备举。这充分说明，在军事重大问题上，如关于政治、外交斗争在战争中所起决定性作用，关于军事的重要性，关于战前审慎地进行战略决策的必要性，关于备战的重要性，关于避实击虚等等，孙子是师承了管仲的行事与理论的。

总之，齐国是块孕育军事文化的沃土。西周初期，姜太公最早在这里耕耘播种，春秋时期，这块沃土培育了齐桓公、管仲，接着培育了田穰苴、孙子，战国时期又培育了孙臧、田单，而孙子正是植根于齐国这块军事文化沃土上承前启后的人物。陈无宇、田穰苴、孙书、孙子、孙臧、田婴、田忌、田单都是军事世家田氏家族的著名兵家、战将，而孙子及其著作正处于巅峰的高度。

(三 黄帝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

孙子论述军队在山岭、江河、盐碱、沼泽、平原旷野地带安营扎寨、行军布阵作战原则时，赞扬“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行军》)他还一再高度评价“昔之善战者”(《形》)；“古之善用兵者”

(《九地》)这说明孙子认真总结过自黄帝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战争的经验。

中国远古华夏民族的传说时代，“黄帝有涿鹿（今河北境内）之战”^①，颛顼有共工之陈^②，这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之间的原始战争。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的许多战争，如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今陕西户县西）之战，这是新生的奴隶主反对旧氏族部落的战争。商汤王灭夏桀王的鸣条（今河南封丘县东）之战，周武王灭商纣王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这是新兴的奴隶主推翻腐朽的奴隶主统治的战争。这时期，战争谋略的运用已具雏形，如审势待时而动，量力而行，争取与国，合众击寡，伺隙击弱，机动进退等。

特别是春秋时期，战争连绵不断。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统计，鲁史《春秋》记载的 242 年间，列国军事行动为 483 次；据《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统计，春秋时期战争为 384 次。这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争霸、诸侯国内部统治阶级这个集团与那个集团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总之，大大小小的战争未曾停息过。一方面，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另一方面，促进了统一，促进了融合，培育了许多著名的战将、军事家，积累了丰富的斗智斗勇的战争经验。

春秋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兵器得以改进，锋利的铁兵器和远射程的弓弩业已出现；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士卒成分得以改变，逐渐打破了只许“国人”当兵的旧制，步兵、舟师兴起，常备军队数量剧增，专职将帅随着产生；同时，营寨壁垒出现，战场从平原旷野向险阻地区扩展，动转不灵的方阵向多种战阵演进，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斗时间逐渐

^① 《史记·律书》。

延长，厮杀激烈程度也在加剧，战场流动性更为增大。因而，作战机动能力日益提高，各种作战方略应运而生。

下面从 4 方面评述春秋时期的著名战例：

1. 奇兵制胜的战例

公元前 718 年，郑、卫北制（今河南荥阳虎牢）之战。郑国攻打卫国，卫国支使邻国南燕之军抵御。郑军佯装与南燕军正面对阵，暗里却调一支制人组成的军队“潜军军其后”，南燕军“不虞制人”偷袭，因而郑国“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①。

公元前 707 年，周、郑繻葛（今河南长葛县）之战。周桓王率周军和陈、蔡、卫等诸侯军队伐郑，郑庄公率大军迎战于繻葛。根据大夫子元的建议，郑军布成“鱼丽之阵”，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形成步卒与车兵配合严密、攻防灵活的整体；并确定首先以郑军两翼出击，先后打败周桓王指挥的实力薄弱的由陈人组成的左军和由蔡人、卫人组成的右军。由于“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军两翼乘机“萃于王卒”、“合以攻之”集中兵力攻击周王中军，以致桓王中箭负伤，“王卒大败”^②。

公元前 575 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之战。晋厉公在本国处于劣势之际，采纳了苗贲皇的建议：“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族，必大败之”，当机立断，改变部署，灵活用兵，首先加强两翼兵力，猛烈攻击楚军薄弱的左、右军，当楚军两翼被突破后，然后投入强大中军，再捣楚军中坚，从四面集中突破楚军主力——中军王族（楚共王警卫中军），终于迫使楚军夜遁^③。

2. 诱敌设伏制胜的战例

① 《左传》隐公五年。

② 《左传》桓公五年。

③ 《左传》成公十六年。

公元前 714 年，郑御北戎之战。北戎袭郑，郑车兵受地形限制，不及北戎步兵灵活，易遭突然袭击，郑庄公深以为忧。郑公子突针对北戎兵轻率无秩序、贪得不团结、战胜争利各不相让、战败贪生各不相救的弱点，主张诱其深入，设伏以待之。庄公从其计，命祝聃率军分三批埋伏，再以一些兵士为诱兵。两军交战，郑诱兵和戎兵一接触就赶紧佯败，抛弃财物。戎兵前队见利只顾紧追，遭遇郑军伏兵，很快败退奔逃。祝聃指挥伏军追逐之，将其拦腰截断，前后夹攻，全部歼灭。戎兵后队见前队失利，各自拼命奔逃，郑军乘胜追击，大败戎军。^①

公元前 700 年，楚、绞（今湖北郧县西北）之战。楚军首先驻扎绞城南门外，莫敖屈瑕针对绞国轻浮寡谋的弱点，建议对本国砍柴兵不设保卫，以此引诱绞国兵出城。建议被楚武王采纳。绞军因而轻易俘虏了楚国 30 个砍柴兵。第 2 天，绞军见利争相出城，又将楚国砍柴兵追逐到山里，却在山下遇到楚国伏兵，大败，逃向绞城北门，不料，楚军早已分兵坐等绞城北门外，因而无法进城。楚国于是迫使绞国签订了城下之盟。^②

公元前 560 年，吴、楚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长江北岸）之战。吴国侵犯楚国，楚国大将养由基率军奔赴迎战，司马子庚领兵紧随。养由基对子庚说：“吴国乘我们国丧（共王去世），以为我们不能整军出战，必然轻视我们而不加戒备，请你设置三处伏兵接应我，我去引诱他们。”子庚遵照养由基的吩咐办了。吴、楚战于庸浦，吴军误中埋伏，大败，公子党被俘。^③

公元前 519 年，吴、楚鸡父（今河南固始县东南）之战。楚以顿、胡、沈、蔡、陈、许 6 国军队为前阵掩护楚军，当时 7 国联军

① 《左传》隐公九年。

② 《左传》桓公十二年。

③ 《左传》襄公十三年。

“同役不同心”，而楚国又刚丧元帅，代帅不负众望，难以统驭全军。吴王僚采纳公子光建议，以左、中、右三军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战阵的三千罪犯为诱兵攻打胡、沈、陈 3 国军队。刚一接战，吴国诱兵即溃退，3 国军队见利贸然进击，遭到吴军伏击，败退。吴军乘胜俘虏了胡、沈两国国君及陈国大夫，却故纵俘虏逃回，向许、蔡、顿 3 国军队高呼“吾君死矣”，以瓦解其士气。吴军乘势擂鼓呐喊冲击，许、蔡、顿军见状大惊，不战自溃，楚军未及摆开阵势就受到猛烈冲击，纷纷奔逃。^①

3. “示形”制胜的战例

“示形”，既可示弱，又可示强，造成对方错觉，判断失误，再寻机战胜对方。

公元前 706 年，楚武王进攻随国（今湖北随县南）前，故意派人向随求和，让随国少师检阅本国的“羸师”（疲弱士卒）、“毁军”（乱七八糟的军容），以助长随国骄傲自满情绪。第 3 年，随国少师得宠，楚国认为时机已到，武王率军讨伐随国。虚骄心十足的随侯、少师一再拒绝季梁的合理建议，率军于速杞（今湖北应山县）正面攻打楚武王所处的强大左师，随军大败，随侯只身逃脱，少师被俘。^②

公元前 611 年，楚庄王灭庸（今湖北竹山县上庸）之战。楚国发生大饥荒，庸国乘机率领群蛮叛楚，麇国（今湖北郧县）也率领百濮聚集于选（今湖北枝江县），将攻打楚。此时，楚一方面紧闭申（今河南南阳市）、息（今河南息县）的北门，以防中原诸侯入侵；另一方面先出兵攻打较弱的麇与百濮，迫使其罢兵，然后攻打庸国。楚军采用大夫潘筮（师叔）“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奋发），而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② 《左传》桓公六年、八年。

后可克”的战术，与庸军接战，7次接战都佯败示弱。庸人因而骄傲地说：“楚不足与战矣”，便不再设防。楚庄王在临品（今湖北均县）和前敌部队会师，将军队分成两支夹击庸军。适逢秦军、巴（今湖北襄樊市附近）军也来援楚。群蛮见楚强，表示服从楚王，和楚结盟。楚庄王于是灭掉了庸国。

公元前559年，吴、楚棠（今江苏六合县西）之战。楚康王命子囊在棠率兵攻打吴国，吴军示弱，坚守不战，楚军只得班师而回。子囊殿后，认为吴军不行，便不加警戒。吴军却从皋舟的险道杀出，对楚军拦腰截击，使其无法彼此救应，得以大败楚军，俘虏了楚公子宜谷。^①

公元前555年，齐、晋平阴（今山东平阴县东北）之战。晋平公率领11个诸侯国的军队攻打齐国，齐灵公在平阴抵御。诸侯的武士攻打防门，齐国兵大都战死。晋国范宣子虚张声势，告诉齐国析文子说：晋同意鲁、莒各自出动一千辆战车攻打齐国都城。齐灵公听后便轻信了，非常恐惧。接着，齐灵公登上平阴东北的巫山（孝堂山）远远侦察晋军。晋军司马已经命人排除山林沼泽的险阻，即使军队达不到的地方也树起大旗，稀疏地布置军阵；让战车左边坐上真人，右边放上假人，树大旗前导，战车后面拖上树枝跟上，使尘土飞扬，如大军奔驰。齐灵公在山上看到这些，害怕对方人多，就离开军队脱身而逃，齐军夜晚也逃遁了，平阴成了一座空城。晋接连虚张声势，威慑齐灵公，从而获胜。^②

4. 后发制胜的战例

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境）之战。齐桓公率军攻打鲁国。虽齐强鲁弱，但鲁庄公因内政修明，取信于民，

① 《左传》文公十六年。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③ 《左传》庄公十年。

便决心抵抗。深谋远虑的曹刿参与指挥。两军于长勺列阵毕，齐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擂鼓发起冲击，均未奏效。这时齐军疲惫，士气衰竭，鲁军阵势却很稳固，士气高涨。深深懂得“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争规律的曹刿眼见战场上已呈“彼竭我盈”之势，对鲁大为有利，建议庄公乘机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齐军。鲁庄公急于驰车追逐，曹刿担心齐军佯败设伏，经过考察观测，确认齐军“辙乱”“旗靡（倒）”，真败无疑，才建议乘胜追击，将齐军逐出鲁境。^①

公元前 632 年，晋、楚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城）之战。原来，楚成王以令尹子玉为主将，率楚、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包围宋国都城（今河南商丘市南），宋向晋求救。晋文公决定救宋。晋文公首先成功地运用军事外交策略，既与齐、秦结盟修好，促使齐、秦出兵助战；又许曹、卫复国，使其背楚从晋，因而使楚陷入相对孤立。子玉怒而释宋围，追赶晋军。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锋芒，争取主动，便命令晋军退避“三舍”（90里）。这样，既可向齐、秦两军靠拢，又诱使楚军尾追。骄横的子玉不听楚成王“无从晋师”的警告，以为晋军畏楚而逃，便长驱直入，陷入不利地位。晋文公这才率晋、齐、秦、宋四国之军与楚联军在城濮展开决战。战斗开始时，晋军为了避免与楚中军主力决战，令其下军佐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向楚右军发起猛攻。楚右军是由其盟军陈、蔡军队组成的，战斗力最薄弱，遭到这一出其不意的打击，立即溃逃。晋上军主将狐毛为了诱歼战斗力较弱的楚左军，接战后故意引军佯退，下军主将栾枝也令阵后战车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败逃。子玉不察虚实，下令追击。于是，楚左军孤军突出，侧翼暴露。晋军元帅先轸指挥中军主力乘机横击楚军，狐毛、狐偃也率上军回师夹击楚左军，楚

^① 《左传》庄公十年。

左军溃不成军。子玉见右、左两军接连失利，大势已去，只得率中军退回楚地，不久，被迫自杀。^① 总之，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既采用了成功的外交攻势，又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指导：后发制人，先击弱敌，佯退诱敌，侧击右翼，两面夹攻。

孙子就是在总结类似上述大量具体战争方略的基础上，高度归纳概括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攻》），“以正合，以奇胜”（《势》）、“利而诱之”（《计》）“以此（“形之”、“予之”）动之，以卒待之”（《势》）“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避实而击虚”（《虚实》）等等著名战略战术的。

（四）华夏军事理论的升华

战争锻炼了军事家，也凝聚了军事理论。

《孙子》既提到了“兵法”（《形》）又具体引用过古兵书《军政》（《军争》），这说明孙子是研读过不少兵书战策的。这些“兵法”，应该首先包括孙子先辈的军事著作，其次包括齐国前哲的军事著作。关于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和齐国前哲姜太公兵法与管仲军事著作对孙子的影响前面已经论及，下面着重论述华夏其他政治军事思想对孙子的影响。

夏王启举兵讨伐有扈氏，将战于甘，首先进行战争动员，告诫将领，说明兴师理由，接着宣布赏罚之法。^②

商汤王举兵讨伐夏桀王前，也是进行战争动员，首先说明兴师征伐的理由，接着申明赏罚。^③ 同时，商汤王左相仲虺便是一位颇有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② 《尚书·甘誓》。

③ 《尚书·汤誓》。

军事谋略的政治家，他就说过：“亡者侮之，乱者取之。”^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周易》的卦辞、爻辞，内容牵涉到哲学、政治、军事、历史、伦理、自然等多种思想，而郭沫若认为，关于“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②。大体说来，《周易》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慎战。如“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上九》）。意思是对于愚昧之人或昏乱之国，侵犯不利；抵御其侵犯有利。第二，量敌用兵。如“晋其角”^③，维用伐邑”（《晋·上九》），意思是进兵侵伐必须较量敌我双方的力量，考虑是否攻城伐邑。第三，战前必须深思熟虑，运筹计划。如“由豫，大有得”（《豫·九四》）。第四，军队必须由有德、有道之人指挥。如“师，贞丈人吉”（《师·卦辞》），第五，行军打仗必须有严明纪律。如“师出以律，否臧凶”^④（《师·初六》）。第六，军队实施突然袭击。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九四》），意思是敌人突然袭击，进行烧杀抢掠。第七，军队对有利地形的利用。如“伏戎于莽，升其高陵”^⑤，三岁不兴”（《同人·九三》）。意思是埋伏时要把军队隐蔽于草丛密林，使敌人无法见到。若登高山，敌人见之，必为所算，甚至覆军杀将，遭此大败，将长期不振。其他，如打有准备之仗、进行军事训练、赏罚等，则不备举。

周武王举兵讨伐商纣王时，在牧野（商都朝歌南七十里）决战前，训示友邦国君大臣、本国从征将领和周的八个联盟部落首领，首先说兴师征伐之由，其次说明如何列阵攻击，最后说怎样处理俘

① 晋国随武子（士会）中行献子（荀偃）和郑国子皮都援引过此语。（《左传》宣公十二年，襄公十四年、三十年）《逸周书·武称》：“乱者取之。”《孙子·计》袭用仲虺此语，写成“乱而取之”。

②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982年版第4页。

《孙子·虚实》用了“角”的概念：“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④ 晋知庄子（荀首）援引过此爻辞。（《左传》宣公十二年）

⑤ 《孙子·军争》用了“高陵”的概念：“高陵勿向，背丘勿逆”。